

◆白城英烈

# 阎群昌 (上)

●吴长安

报国救民驱日寇。阎群昌(又名严正芳,1921年—1946年)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南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他进入本村小学读书,努力求学,刻苦用功,上进心极强。由于军阀混战,兵匪猖獗,乡野凋敝,民不聊生,一家人的生活日益艰难。他不得已离开了学校,辍学回家做工,以帮助家用,替父母分忧。他先到北平一家绸缎店当学徒,期满又到饶阳县东章织布厂做工。

这期间,中国大地风雨飘摇,黑云压城。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丧心病狂地将魔爪伸向我国东北,很快占领了吉林、辽宁两省。东北三省近200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落入魔掌,3000万同胞遭受日寇的蹂躏。从此,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而这时国民党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集中力量向解放区进攻,围剿共产党,置侵略者在国土上大肆烧杀抢掠于不顾,采取不抵抗政策。1935年5月,一纸“何梅协定”日本侵略者攫取我华北主权。10月,进而提出“华北三原则”。11月,更进一步策动汉奸搞“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不断蚕食神州领土,实施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这时,中国共产党及时发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号召,1936年12月9日,组织领导北平大专

院校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社会各界迅速掀起抗日救国的高潮。

这时,阎群昌在厂内结识了一位进步工人,他经常跟阎群昌谈论抗日救国的事情,满腔悲愤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法西斯本质,启发阎群昌的民族意识,激励阎群昌认清自己的使命。这位工人的话像春雷滚过阎群昌的心头,激起了阎群昌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阎群昌摩拳擦掌,义愤填膺,决心和东北人民共同战斗,把侵略者赶出去。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不断地接受各种考验,逐渐踏上了革命征程。

1937年芦沟桥的枪声,点燃了全国军民团结抗日的烽火,亿万同胞同仇敌忾,举国上下沸腾,抗日的呼声响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阎群昌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开展抗日斗争。他一回村里,就和弟弟一起,带领全村青年积极投入抗日活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了抗日武装——南寨村青年抗日先锋队,他担任队长。他的家成了抗日堡垒户。日本鬼子疯狂地打击抗日活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阎群昌在自家住房下面挖了地道,县区干部常来这里开秘密会议或者躲避敌人的搜捕。

阎群昌在抗日斗争中,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残酷的对敌斗争使阎群昌迅速成熟起

来。1939年,阎群昌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被选为南寨村村长。这年他刚满20岁。

阎群昌在对敌斗争中,机智灵活,有效地打击了敌人。1942年初,日寇在冀中发动了大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阎群昌带领民兵白天参加生产劳动,夜里出来反奸除霸、挖公路、割电线、骚扰、打击敌人。他还派人打入敌人内部,收集情报,了解敌人活动情况,以便有力地打击敌人。

1944年正月十七,按照上级部署,阎群昌同村干部制定巧取南寨村日军炮楼计划。先派联络员李大轩、张顺和混入炮楼与内线张根顺一起,趁敌人在碉堡外吃饭,枪支放在炮楼里之机,抓住逃兵,放下吊桥,阎群昌率领游击队和部分群众冲进去,包围了敌人,占领了炮楼。38个日伪兵乖乖地做了俘虏,没费一枪一弹,从日本人手里夺回了南寨村。同年6月19日夜,他听说区武工队要打辛营桥日军炮楼,主动赶去参加战斗。战斗中,他被飞起的弹片打伤,40多天后才康复。

阎群昌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使党组织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1943年秋的一天,特务张结巴带两个人,伪装成我冀中第九军区分区干部,到南寨村找阎群昌,诡称要召集全区党员,安排抗日活动,并向他要党员名单,妄图把当地党员一网打尽。阎群昌和区公安员高建兴虽然验证

了来人的介绍信和证件,但因事关重大,还是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他们把来人安排到一个僻静处住下。当晚,通过在炮楼的内线张根顺了解到张结巴三人是敌人派出的特务。阎群昌连夜召开干部会议,制定擒敌计划。第二天,他派人买来好酒好菜,款待三个特务。席间,他笑着说:“对上级派来的人,我们要好好招待。”他和几个干部轮番敬酒,敌人自以为得计,无所顾忌地大吃大喝起来,最后,喝得酩酊大醉。阎群昌与同志们乘机活捉了他们,审讯后在村外处决了他们。

阎群昌在任何情况下,都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处理问题干脆果断。1942年大扫荡期间,一天区里的几位领导干部张杰等到南寨村召开会议,传达上级文件,会议开到中间,有人报告说“敌人来了”。这些十分重要的文件,如果落到敌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可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好主意。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阎群昌麻利地将文件一卷,往袖里一塞,转身朝村外迎着敌人走去。敌人叫住他进行搜身,他把双手高高举起,装成顺从的样子,让日本兵来搜。他个子大,日本兵个子小,搜遍全身也未见可疑之物,就放行了。敌人走后,阎群昌又急忙赶回村子,看看同志们有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同志们对他临危不惧化险为夷的行为赞赏不已。

1944年,由于阎群昌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出来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良好的个人素质,被调到区里任财粮助理。这个工作有些琐碎,整天到晚忙个不停。阎群昌无论做什么,都非常勤奋、认真,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

(八十七)

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

## B 白城记忆

白;而青山的反衬,使得红花颜色更红,仿佛燃烧起来。作者巧妙借助对比与衬托,描绘出春天明丽的色彩,表现了春天达到极盛时的特点,也为下文情绪的转变得埋下伏笔。

大凡极盛则预示着衰败的开始,敏感的诗人总能感受到这一点。美好景物背后的哀伤、欢宴之后的凄凉、繁华之中的落寞,诗歌中常有的这种情绪表达,正是人类喜爱美好、厌恶衰残心理的表现。所以,诗人看到春天如此明媚,却陡然想到,春天看着就要过去了,又是一年来到,身在异乡,虽暂时安定,却归期遥遥,诗人不禁感叹:何日才能回到故乡?这里既有回归家乡的渴盼,又有着漂泊异乡的悲伤。从这个角度,前二句写春日观景,也许是诗人想获得暂时的逃避,然而愁情一生,则无可驱散,这景物反倒成了诗人情感抒发的媒介,因而染上了一层忧郁的色彩。(雨果)

### 诗词鉴赏

## 绝句二首(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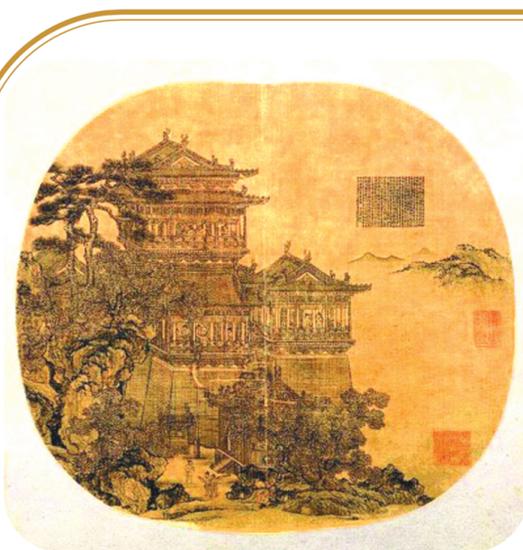
●[唐]杜甫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赏析】

人们观赏赋诗,无外乎几个指向:一是绝料的审美,将景物当作外物来欣赏,发现独具的美;二是借观景做逃避,卸除内心的负累,获得短暂的忘却;三是以景作为心志抒发的媒介,或因情寄景,借景抒情,或以理赋景,借物说理。当然,在大部分诗歌中,这些指向往往混杂在一起,难以清楚地分辨,或许是因为人的情绪总是复杂的、多变的吧。因而,景物的描写往往有着多重的指向。

如果说杜甫《绝句二首》(其一即“迟日江山丽”那一首)更多是对春天美景的纯粹欣赏,那么第二首的指向则相对复杂一些,既有纯粹的观景,又有因乐景而陡生的思乡情感的表达。诗歌前二句是第一首诗的延续,描绘春天的诗情画意,其意境之明媚、格调之清新是相同的,只是色彩更为浓烈。江水深碧如玉,鸟儿轻掠水面,山色青青如黛,花儿遍山遍野开放,正是典型的春日景色。更妙的是,在碧水衬托下,鸟儿翎羽更显其



岳阳楼图

夏永/绘

唐代以来,有一个比较奇特的文化现象。文人仕宦且官居高位者,大都期望被皇帝赐封一个谥号——文正。但是作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这个谥号把持得非常严格,轻易不许可。

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博得文正这个谥号的人,大都是当时朝廷高度评价和文人交相赞誉的国之重臣。历宋、元、明、清四朝,共有26位股肱之臣生前或死后获赠文正谥号这一盛誉,其中宋代有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等9人,元代有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等5人,明代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等4人,清代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

振鏞、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等8人。

文正这个谥号在唐代作文贞,有唐一代先后有魏征、陆象先、宋璟、张说等4人荣膺文贞谥号。宋代承袭唐制,将文贞这一谥号传承下来,王旦等大臣都被谥为文贞。到了宋仁宗执政时,鉴于仁宗的名字叫赵祯,为了避皇帝名讳,遂将文贞改为文正,特别是经过司马光的“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文正是溢之极美,无以复加”一番阐释,文正遂成为古代文人做官后梦寐以求的谥号,因为受封此谥号的官员,无论忠、奸、廉、希、宪等5人,明代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等4人,清代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

振鏞、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等8人。

文正这个谥号在唐代作文贞,有唐一代先后有魏征、陆象先、宋璟、张说等4人荣膺文贞谥号。宋代承袭唐制,将文贞这一谥号传承下来,王旦等大臣都被谥为文贞。到了宋仁宗执政时,鉴于仁宗的名字叫赵祯,为了避皇帝名讳,遂将文贞改为文正,特别是经过司马光的“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文正是溢之极美,无以复加”一番阐释,文正遂成为古代文人做官后梦寐以求的谥号,因为受封此谥号的官员,无论忠、奸、廉、希、宪等5人,明代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等4人,清代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

振鏞、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等8人。

在博物馆的公共归属无争议的情况下,广泛、平等、无差别的接触权成为博物馆积极追求的目标。通过拆除时间、空间层面的边界,博物馆试图赋予更多的社会成员以接触便利。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

在博物馆的公共归属无争议的情况下,广泛、平等、无差别的接触权成为博物馆积极追求的目标。从这个意义看,云端博物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和包容。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大众参与方式。各种活动从遍布全球的各个博物馆转移到网络云端。不过,各大博物馆并没有显得措手不及、无所适从。历经数月的试行调整,不少博物馆已习惯了日常化的在线开放。除了网站和公众号上的静态展示,云导览、微视频、空中讲堂和“问问馆长”之类的在线互动也层出不穷。

这归功于数年前就已启动的“智慧博物馆建设工程”。博物馆的虚拟化、在线化和智能化早已按部就班地进行,现阶段又加快了这个进程。

国际博物馆协会提出,如果博物馆执意举办现场活动,建议在全球疫情消退后,参加11月中旬的“博物馆漫长夜”。“博物馆漫长夜”是一项特别的博物馆延时开放活动。活动期间,很多博物馆将开放时间从白天延长到午夜1点。午夜时分,灯火通明的场馆和在各家博物馆间匆匆穿梭打卡的观众,将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

如果将云端博物馆和“博物馆漫长夜”联系起来,便会发现两者间意味深长的关联,这恰好展示了博物馆不断突破边界、增强博物馆的可接触性、实现更好开放和更大包容的探索历程。

“无界博物馆”一直是博物馆的追求。通过拆除时间、空间层面的边界,博物馆试图赋予更多的社会成员以接触便利。从定时开放、周末开放、调整博物馆闭馆日,到增加更多博物馆延时开放日,博物馆一步步赢得了更多观众。博物馆也在不断突破空间边界。很多城市的机场、商场,甚至地铁里都出现了卫星式博物馆。受“临时展览”概念的影响,有了流动博物馆,可以走出博物馆,将任何场地转变为临时展厅。数字和网络技术为博物馆的“无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体博物馆中无法想象的跨地区、跨时区距离,展柜内外的边界,有限展厅与库房的边界都被顺利克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永不落幕”。

每一次打破边界,都有可能伴随着更多、更深、伏而不察的边界。比如,那些不能在正常开放时间参观博物馆的人们可能也无法在子夜时分流连于博物馆,依赖于文物车的“流动博物馆”无法经常深入到一些偏远地带……这都将引导博物馆思索存在于教育、性别、年龄等方面的更多边界,并启动新一轮“破界”。

在以视觉形象为主导方式的博物馆里,视障者的接触权始终是难以界定、缺乏有效解决方案的问题。在实体展厅中,我们尝试通过建立视障展区或者展线来回应这个问题。智慧博物馆也在探索满足视障者的新技术,如一款名为“做我的眼睛”的手机应用程序,探索数字技术如何帮助视障者“观展”。

数字博物馆和智慧博物馆的确带来了革命性变革,但并不意味着博物馆在追求“无界”上大功告成。在实施预约参观的举措多年之后,博物馆前人工通道上依旧大排长龙的场景值得关注。对此,博物馆可能需要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技术。对于追求平等、多元和包容的博物馆来说,“无界”从来不会简单地一步到位,而是一种永无止境追求。

## 鲁迅与螃蟹

●周惠斌

李白、苏轼、袁枚、李渔、张岱等许多文人墨客都钟情于蟹,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文赋和精彩美妙的逸闻趣事。鲁迅也不例外,他品蟹写蟹,信手拈来,涉笔成趣。

每当秋高气爽、菊黄蟹肥时节,鲁迅总会选购肉质鲜嫩的螃蟹,邀约亲友一起细细品尝。《鲁迅日记》中不乏吃蟹的记录,以1932年10月为例,就曾3次出现买蟹、吃蟹、送蟹的记述。其中,10月15日“晚邀三弟全家来寓食蟹并夜饭”,10月23日“三弟及蕙如携妻儿来,留之晚餐并食蟹”,10月27日“上午广平买阳澄湖蟹分赠镰田(镰田诚一)、内山(内山完造)各四枚,自食四枚于夜饭时”。可见鲁迅寓居上海后,时常与家人或友人饮酒食蟹,甘之如飴,分享兄弟之情、朋友之谊,其乐融融。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鲁迅以笔名“神飞”,在8月21日《国民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螃蟹》的寓言:

老螃蟹觉得不安了,觉得全身太硬了。自己知道要蜕壳了。他跑来跑去的寻。他想寻一个窟穴,躲了身子,将石子堵了穴口,隐隐的蜕壳。他知道外面蜕壳是危险的。身子还软,要被别的螃蟹吃去的。这并非空害怕,他实在亲眼见过。他慌慌张张的走。旁边的螃蟹问他说:“老兄,你何以这般慌?”他说:“我要蜕壳了。”“就在这里蜕壳不好么?我还要帮你呢。”“那可太怕人了。”“你不怕窟穴里的别的东西,却怕我们同种么?”“我不是怕同种。”“那还怕什么呢?”“就怕你要吃掉我。”

整篇寓言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提醒人们:新生事物往往有被旧势力消灭于萌芽状态的危险。

1924年11月17日,鲁迅在北京《语丝》周刊上发表了著名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文章从杭州雷峰塔倒掉的消息写起,引出白娘子被法海和尚装人钵盂,镇压在雷峰塔底下,玉皇大帝知道后,责怪法海荼毒生灵,下令捉拿他,法海“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壳里避难”的传说。随后写道:“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那(哪)一只,揭开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在记述这则民间传说时,鲁迅将蟹的内部结构、煮食方法,描写的细致入微,情趣盎然,特别是“揭”“露”“切”“取”“翻转”等一连串动词,反映出鲁迅吃蟹技术的娴熟和准确。篇末以“活该”二字作结,表达了鲁迅嫉恶如仇的感情。

自然界中,螃蟹走路呈横爬状,现实生活中,亦有不少人像蟹一样“横着走”,令人愤慨。1926年11月25日,鲁迅在《莽原》半月刊上发表《琐记》一文,回忆自己早年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有那些高年级学生“上讲堂时挟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书,气昂昂地走着”,“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低一班的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鲁迅以揶揄的笔法,尖锐地抨击了身边同学中的这种丑恶嘴脸和霸道行径。进而笔锋一转,直指位居显赫者:“这一种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现在都阔别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的破脚踏椅上,发现了这姿势,然而这位老却并非雷电学堂出身的,可见螃蟹态度,在中国也颇普遍。”由此及彼,将社会上某些人恣肆横行的行为,类比为螃蟹的形态和走姿,予以无情的嘲讽和批判。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这句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出自1932年11月22日鲁迅在北平辅仁大学的演讲《今春的两种感想》(后经作者修订发表于11月30日《世界日报》)。鲁迅指出“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他举例论证道:“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赞誉了人类历史上那些不怕牺牲、大胆探索的先驱者的无畏精神。

## 谁能成为“文正”公

●刘金祥

人文指向。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指出:文所以载道也。郭沫若在《关于文风问题答(新观察)记者问》中对此解释道:“文以载道”,用现在的话来说,写文章就是表达思想”,由此可见文以载道是对文学社会作用的深刻表达和精辟概括。无论是阅读一篇文章,还是浏览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人们将眼光仅局限在文本本身,那肯定体会不到文本所蕴含的更高远的境界,肯定获得不了更深层次的思想。读书作为传统中国官员方面有殊异才能,又在当官从政方面显示出卓越才干,成为诠释“文”“正”“政”三者内在关系的有力而恰切的佐证。

曹丕在《典论·文论》中曾经写道: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魏文帝认为撰写文章有两大效能:作为“经国之大业”,文章有利于治理国家;作为“不朽之盛事”,文章有益于修身养德,乃至实现个体生命价值联系起来,使文人的功效得到空前提升。鲁迅先生对曹丕的观点深为赞同,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指出:曹丕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正是由于“自觉”,才笃化了治国大业

文章,促进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深度融合,官至尚书右丞,所撰《潜居士文集》存留至今。一代大儒方孝孺,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举止醇厚,坚贞不屈,孤忠赴难,被诛十族,官至文学博士,所写《逊志斋集》铭刻青史。晚清第一重臣曾国藩,是清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兼备,恭顺踏实的大臣,属于中上档次;“文成”一般用于赏赐那些治理有方的文臣;“文端”往往用来赐予知名理学家和品行方正的大臣;“文襄”大多用于赐封那些为开疆拓土作出贡献的大臣。

我国语言文字含义丰赡,几乎每一个汉字都蕴含着先哲的卓越智慧,都承载着先民的人文追求。不少汉字都为字音藏义、字形藏理,以文化的“文”与正直的“正”相结合,就是政治的“政”字,所以得谥“文正”之人,几乎都是为文从政这一文官群体中的佼佼者,这些人也的确通过“立德、立功、立文”,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传承后世的声名、功勋和主张。

以千古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垂范后世的范仲淹,既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又是蜚声文坛的文学家,其为政清直,刚直不阿,官至参知政事,谥作“范文正公”享誉后世。“以儒治论,以佛治心”的耶律楚材,是元代著名政治家,曾协助成吉思汗、窝阔台制定多种效仿汉制的政策与

我看我说

## 博物馆的『无界』之路

●徐坚